

泉州藏书史

陈文革 著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two multi-tiered pagodas, one on the left and a larger one in the center-right. Stylized, swirling cloud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base of the pagodas and in the foreground. The entire scene is rendered in a monochromatic, textured style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吉林文史出版社

泉州藏书史

陈文革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藏书史 / 陈文革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72-0672-0

I. ①泉… II. ①陈… III. ①藏书-图书史-泉州市

IV. ①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521 号

泉州藏书史

著 者:陈文革

装帧设计:许哲宗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出版大厦

网 址:<http://www.jlws.com.cn/>

邮 编:130021

印 刷:泉州市鲤城正立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毫米)

印 张:7.8 印张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字 数:200 千字

书 号:ISBN978-7-5472-0672-0

定 价:48.00 元



前 言

泉州,地处祖国东南隅,享有“海滨邹鲁”盛誉。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欧阳詹“温陵甲第破天荒”后,泉州文教事业渐入佳境,著述、刻书、藏书活动日益活跃,泉州藏书事业呈现出各具不同的时代特征。藏书事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变化与不同时期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因此,研究藏书事业除了要研究藏书事业本身外,还要把影响藏书事业的各种因素结合考察,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不同历史时期泉州藏书事业的面貌。藏书研究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对藏书文化发展的研究;藏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关系的研究;藏书思想、制度的研究;藏书机构、藏书家的研究;书厄研究等等。从狭义上说,藏书研究主要包括藏书主体、藏书客体、藏书活动以及藏书背景。藏书主体为藏书机构和藏书家们。皇室藏书(官府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构成我国古代的藏书主体(体系)。藏书客体为典籍图册。藏书活动包括图书的征集、访求、鉴别、保藏、散佚、研究等。藏书背景主要是指与藏书密切相关的刻印书、书坊、书肆、造纸等行业,以及与藏书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

唐、五代时期,泉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文化教育事业仍没有大改观,虽然贞元八年(792年)春,欧阳詹首登“龙

虎榜”高中进士，“温陵甲第破天荒”，但是与其它地方相比较，泉州文化教育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唐五代泉州没有正式的州学，孔庙（唐时称为鲁司寇庙。五代改称为宣圣庙）只供祭祀，并不具备教育功能。各县均未建有县学。更遑论官府藏书了。唐咸通九年（868年）印制的《金刚经》，刻工优美，印制精良，说明我国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雕版印刷术业已传入泉州，只是泉州的印刷出版业还稚嫩。

唐代泉州佛教寺庙较隋代有长足发展，讲经、译经、注经活动相当活跃。开元寺经楼藏量达三千卷。唐五代泉州书院的数量极少，仅有南安石井的杨林书院、晋江的集贤书院和张九宗书院。书院处于萌芽发端阶段，书院藏书微乎其微。唐五代泉州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整体上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未见有私藏及私人藏书家载于史籍。

宋代，泉州地区大放异彩，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科举兴盛，在历朝中宋代进士人数最多，著述数量也比前代大幅增加，刻书业颇为发达，出现官署、坊间和私人刻书，出现专门以刻书为业的村落。坊间和私人刻印书，有士礼居、仪顾堂、温陵中和堂等坊号、堂号。泉州所印书籍通过泉州港流传至海外，张秀民先生语：“宜其刻书为诸州冠也。”

宋代泉州建立了完整的州学、县学，而且各种形式的私学也得到发展，其数量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唐五代。为了教学需要都要收藏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各种类型的图书。《泉州府志》记载了太守刘子羽重建的孔庙规制中，设有藏书阁；宋代泉州太守章良曾增加官书3500多本的事迹。

宋代泉州书院和书院藏书有所发展。根据《泉州府志》及泉属各县县志记载,宋泉州境内先后建有十所书院,规模都很大。书院藏书楼多建在书院中轴线上,或位居讲堂之后,显示出藏书地位的重要。主要收藏朱熹所编著的书院文化教育教材,如《小学》、《近思录》、朱熹生平的力作《四书集注》以及多种《四书》辅导教材等。

宋元时期是泉州佛教最为鼎盛的阶段。寺院凡千百数,财力雄厚。僧尼众多,不乏名僧和佛教著述。开元寺规模宏大,藏经处所几经变迁,先为经楼,次为藏殿,再为甘露戒坛、法堂。

宋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十分重视读书、藏书,形成了非常浓厚的收藏图书的社会风气。宋元时期泉州私人藏书起步萌芽,藏书家计有 11 位。

明代泉州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科举兴盛,著述者众多,大家辈出,著述量更是空前。明代泉州享有“人文之盛,甲于闽省”的美誉。数量庞大的读书人对书籍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加之丰硕的著述,两者促进了印刷出版业的发达和繁荣。私家刻书业有相当程度的规模,出现了堂记、坊号。明代泉州民间刻印书非常活跃,刻印书集中于泉州近郊的田庵、淮口、后坂三村,此三村刻工众多,刻印技术高,所刻书籍涵盖经、史、子、集、医学以及农事、通书等民间实用图书。明代泉州有堂记、坊号的有玩芳堂、慎独斋、墨余香堂等。

明代泉州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长官普遍重视教育,府县学得到创建、修建、扩建。各府县学的尊经阁有所发展。如,泉州知府熊汝达、尹庐仲佃建尊经阁于明伦堂东。晋江县学、南安县学、惠安县学、永春县学等在明代不同时期都曾修建过尊经阁。

明代泉州佛教进入衰落时期,不少寺院“僧亡寺废”,寺院藏书

受到极大的冲击。及至明末清初,寺院藏书方才有所回暖,明僧广轮三至江南请经书,使开元寺之戒坛寺得以贮经数万本。

明代泉州书院的发展一波三折,经历了沉寂发展沦落的轨迹,书院的刻印、藏书也与之共荣同损。明代大多数书院都设有藏书室,只是规模大小不一而已。所藏书以“四书五经”等基本教材为主。明代泉州民间私商海外贸易空前的繁荣。私人藏书事业较宋元有所发展,私人藏书家有 11 位。

清初因“迁界”等因素的影响,泉州印刷出版业处于相当长的一段低迷期。清中叶,泉州印刷业重新兴隆,单是田庵、淮口、后坂三村的雕板工人就达 300 多人,除版刻外,还采用活字及套板技术。19 世纪初,铅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开始雕刻汉字字模,印制《圣经》。鸦片战争后铅字印刷术以更快速度在中国推广开,并最终取代了雕版印刷术。

清政府推行汉化政策、重视教育,府县儒学大多在清代进行过多次的修复,作为府县儒学藏书的重要设施尊经阁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惠安螺阳书院、清源书院、崇正书院、诗山书院等都有比较好的藏书楼。

清初泉州佛教得到一定的复苏,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三大佛教丛林都得到重修。但是清政府对寺院的创建和寺产数额有严格限制,加上清政府废除僧侣考试和度牒制度,清末民初佛教日渐衰微。寺院藏书数量以开元寺为翘楚。开元寺藏经阁藏经颇丰,收藏各种版本经书 37000 多卷,2000 多种,计 3341 册。以宋、明刻本最珍,其中有许多是我国珍贵的佛学典籍。

清代泉州出现不少著名的藏书家,各家藏书动辄上万卷。最为著名的当推晋江黄虞稷“千顷斋”,黄虞稷承家传,藏书达八万余卷,著《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传世;安溪的李光地好聚古书,多藏宋元刻本,藏书极其丰富。清代泉州计有藏书家 24 位。

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思想和模式逐渐传入我国,维新变法学者、朝臣提出了“废封建藏书楼立公共藏书楼”的思想。戊戌变法运动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逐步蜕变为近代图书馆的转折点,宣告了古代藏书楼的衰亡,它在藏书体系、读者对象和管理方式上的重大变革,为近代图书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泉州近代图书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诞生的。当其时,新的印刷技术在泉州被引进与使用,泉州整个地区的出版印刷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基督教传教士在泉州各地积极传教,兴办学堂,创建新式图书馆。泉州近代图书馆发展的条件已成熟。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创办的泉州培元中学图书馆是泉州地区最早的图书馆。民国 9 年(1920 年),晋江县公立大众通俗图书馆创建,为小型公立公共图书馆。此后,各地各种形式的图书馆纷纷创立。但由于政局变幻、社会动荡,这时期的图书馆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开办时间大多比较短暂,规模也有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泉州各地的图书馆事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或独立建馆,或与文化馆合并办公。“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书馆受到极大的冲击,陷于关、停、并、转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泉州地区图书馆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焕然一新,勃勃生机。泉州市、惠安县、南安县、晋江县、永春县等地纷纷兴建新的图书馆大楼,图书馆专业人才也不断充实到图书馆事业之中。90 年

代,晋江、石狮、南安、安溪、德化等地继续兴建、扩建、继建新的图书馆大楼。截止 90 年代末,泉州全市公共图书馆的馆舍面积达到 25711 平方米,总藏量达 124 万册,从业人员 125 人。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多媒体技术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图书馆得到普遍的应用和推广,图书馆服务理念、服务手段、方式,服务水平、社会效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书馆进入复合图书馆形态,基本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管理,并向数字图书馆迈进。

2011 年 8 月

目 录

前言/1

一 唐、五代泉州藏书/1

唐、五代泉州刻书 /1

官府藏书 /6

书院藏书 /9

寺院藏书 /17

私人藏书 /20

二 宋、元泉州藏书/22

宋、元泉州刻书 /22

官府藏书 /52

书院藏书 /59

寺院藏书 /66

私人藏书 /69

三 明代泉州藏书/80

明泉州刻书 /80

官府藏书 /85

书院藏书 /87

寺院藏书 /91

私人藏书 /93

四 清代泉州藏书/101

清泉州刻书 /101

官府藏书 /112

书院藏书 /115

寺院藏书 /120

私人藏书 /124

五 近代泉州各县各类型图书馆/151

泉州 /157

晋江 /164

石狮 /170

安溪 /173

南安 /175

惠安 /178

永春 /183

德化 /186

六 地方文献之价值/189

“福州藏”与宋、元泉州刻经活动 /189

地方文献在闽台文化关系中的价值 /196

谱牒的史料价值 /204

透过谱牒看“闽台缘”/210

地方文献与区域文化 /218

民国时期泉州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特征 /224

主要参考文献/236

后记/240

一 唐、五代泉州藏书

唐、五代泉州刻书

唐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州治移于泉山之阳,以山名州,遂定名为泉州。别称温陵(宋朱熹以为城北小山,其地常温故名),隶属闽州都督府。泉州自此始建制。辖晋江、南安、龙溪、莆田、仙游五县。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漳州分治,龙溪归之。泉州地处闽南,与京城长安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隔遥远,信息不畅。因此,唐初泉州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事业也尚处起步阶段,泉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上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随着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管理手段的不断传入,加上与海外诸国(海路所通国家和地区东北至高丽(今朝鲜)、日本,南达南海诸国,西抵印度半岛)的经贸往来,泉州港逐渐兴起。大历年间(766-779年),泉州商贸繁荣,外商聚集。中唐诗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全唐诗·卷208》)诗云:“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唐·薛能咏泉州诗也说:“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泉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确位。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开创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乃是通过层层考试,以考取仕,遵循“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到唐德宗贞元(785-805年)初年,近

180年间,泉州地区竟然无人参加进士考试,因而后人形象地比之为“在汉如长夜,在晋如昧爽。”贞元八年(792年)春,欧阳詹举进士试,以优异成绩登进士第二名。至此,泉州人的科举热情和信心逐渐被激发起来,学风大开,特别是大历以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这一时期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开始走向成熟,主要是印制满足科举用书需要,宗教用书需要,还有日常生活需要的书籍。诸种因素共同促成了写本书向雕版印刷书的过渡。雕版印刷术逐步传播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

唐时泉州到底有没有印书业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具体的理由是:其一唐咸通九年(868年)印制的《金刚经》,刻工优美,印制精良,说明我国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不是属于初期的工艺,也就是说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大大早于唐咸通九年;其二是此时刻书地区已由成都、杭州这两个发祥地向南方北方地区扩展;其三是日本发现的《百万塔陀罗尼经》是属于公元770年的印刷品,而日本的印刷术公认是从中国传去的。不论是陆地交通距离还是海路交通距离,泉州与杭州交通距离要比日本到杭州短的,何况其时泉州港已逐渐兴起,商贸往来繁荣。可以合理推定印刷术业已传入泉州。

另外唐代中后期,泉州文人学者的著述活动开始兴起,各种形式的私学日趋兴旺,印刷事业就相应发展起来。当时泉州的印刷,有盖板、拓板两种,是由盖印和拓石两种方法相结合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盖板印刷,即在尺寸相等的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写字或图像,刷墨板上,然后覆纸其上,用长毛板刷刷过而成。拓石,是将石刻文字转录到纸上的一种印制技法。据王国维考证,这种方法在公元4世

纪时就已经出现。具体技法是：将一张浸湿了的纸，铺在石碑上，轻轻拍打，使纸在石碑凹陷下去地方也凹下去，然后用蘸了墨汁的布团，再次全面轻轻拽捺，这样纸张凹面部分就碰不到墨汁，碑石上的文字就可以不失真的印在纸上了。这一操作过程名为“拓”。拓的对象是碑石，就叫“拓石”；用墨汁名为“墨拓”；用红颜色名为“朱拓”。单幅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漳浦兴教寺僧录记的“沈怀远碑”刻于唐咸通二年（861年），侍郎王讽撰书的“漳州三平师碑铭刻于唐咸通十四年（873年）。两碑均为木刻，书法隽美，刻工精细……证明了漳州地区在唐代就有了木板镌刻，这一点已殊无疑义。”（《福建古代刻书》（谢水顺，李铤著）泉州与漳州相距不远，民众往来频繁，因此两地的木刻技术应该是可以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当拓石技术和木刻相结合以后，这便构成了雕版印刷的主要技术成分。目前，尚缺乏可考的文献资料以印证唐时泉州雕版印书业的细节，但是，综合诸种因素考虑，我们还是可以断定唐时泉州已有雕版印书业，只是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大范围普及，水平也不高。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当时国内四分五裂，军阀林立，历史上又称“五代十国”。五代历时仅53年，但五代的雕版印书比起唐代有所发展。体现在刻书地区扩大，刻书人和刻书数量增多，刻书内容开始由刻杂书到刻儒家经典著作、类书、诗文等，呈现出多样化、丰富化。形成了坊间刻书、私人刻书和官府刻书三者并存的格局。坊间刻书又称“坊刻本”，是指一般书商所刻的书，大都署有书商字号，如某书堂、书铺、书肆、书籍铺、经籍铺等。私人刻书也称为“家刻本”，是指私人出资校刻的书。这种书一般经过精心校订或选择善本进行翻刻，大都数质量较高，一般署有某家塾、某堂、某

斋、某宅、某府等标志。官府刻书又称“官刻本”，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刻的书。五代的国子监，便是政府设立的学校兼印书出版机构了，儒家经典和佛教经典是五代官刻本最主要的两大种类。可查文献记载，五代时期官刻书共 37 种，其中儒教典籍 19 种，佛教经典 8 种，道教典籍 2 种，其他 8 种。

五代泉州刻书印刷业仍然不发达，目前还没有可考文献资料证明五代泉州已清晰出现坊间刻书和私家刻书，但也有半鳞片爪可觅。据《中国古代书坊研究》（戚福康著）一书，“五代书坊业的发展是非常微弱的，甚至与唐代相比反而有所退步。但也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具有书坊经营的城市，如莆田、青州、南京等。并且总的趋势在向东南地区移动。”这里的“莆田”在五代是仍隶属泉州辖，莆田在北宋初析出泉州。“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割所属莆田、仙游别为兴化军（原太平军改为兴化军）；长泰归漳州。”（清·乾隆《泉州府志·卷 3》），这说明五代泉州的书坊刻书业已初露稚芽。官府刻书的水平无疑较坊间刻书、私家刻书高出一筹。五代十国时期，泉州先后为王潮、王审邽、王延彬及留从效等所统治。王审邽、王延彬父子创建招贤院，延揽中原避乱南来的公卿名士。王延彬多才多艺，好谈佛理，优礼僧人。据《泉州府志·版籍志》记，王延钧“遣官弓量田土，定为三等，以膏腴田地尽入寺观，民间乃得其饶窄者，先后如王延彬、陈洪进诸家，多舍田入寺，顾窃檀施之名，多推产米于寺，而以轻产遗子孙，故寺田产米比民业独重焉。”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及节度使留从效大造寺院，大造佛塔，大造（或铸）佛像，大印（或铸）佛经，并大量剃度僧尼。据《十国春秋》载，闽王政权 33 年中，建佛寺 267 座，仅泉州就造 54 造。另一方面王氏